

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研究丛书

主编 马 敏

SHEHUI ZHUANXING ZHONG DE
ZHONGGUO JINDAI
JIAOYUHUI YANJIU

学术文库
博雅
華大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

孙广勇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成果

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研究丛书

主编 马 敏

SHEHUI ZHUANXING ZHONG DE
ZHONGGUO JINDAI
JIAOYUHUI YANJIU

学术文库

博雅
華大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

孙广勇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孙广勇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

(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研究丛书/马敏主编)

ISBN 978-7-5622-3550-7

I. 社… II. 孙… III. 教育—社会团体—研究—中国—近代 IV. 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705 号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

◎ 孙广勇 著

责任编辑:肖 颖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88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25

版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马 敏

近二十余年来,近代中国史研究在进步之中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发挥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发掘曾经沉湮的史料,寻找曾经忽视的问题,以此开发出许多新的主题与领域;二是放宽研究的视野,打破陈见旧习,尝试运用多种方法、范式来解读史事,呈现历史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真实的面貌。这一概括或许未必完整,但近代社会群体及社团史的研究正可见证此点。在打破“阶级”束缚之后,一大批学者埋头搜集商会、行业、企业、部门档案及民间文献,关注主题不断拓宽和加深,由商会、行会、会馆、善堂等进而涉及商团、同业公会、同乡会、教育团体、慈善团体,从而在社会团体及社会群体史研究的基础上重构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团体是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乃至阶级的一种整合方式和活动空间。自晚清以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类社会团体的兴起是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表征及结果。在向所关注的政治团体之外,诸如工商团体、公益团体、同乡团体、自治团体、工会团体、农民团体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各类群体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舞台。团体的建立和团体的活动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有些团体虽以倡导民众自治为目的,但其中又体现了鲜明的国家意志;有些团体效仿西方而设立,却具有浓重的本土特色;有些团体以兴办实业为职志,却表现出积极的在商言政倾向。可以说,近代的社团并不是一

个简单同构的组织,社团提供给历史主体的是一个全新的空间,研究社团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组织的解构。从这个角度上看,社团提供了分析国家与社会、阶层与集团、群体与个体、专业活动与社会参与之间关系的一个视角,社团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就具体社会团体而言;其个性远大于共性,其结社标准、宗旨、成员、活动及集体行动的机制都各具特色,这反映了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慈善团体以社会救济为宗旨,行业组织以行业利益为归属,工会组织以维护劳工利益为目的,同乡团体以乡缘来联结异乡情谊,不同的团体都有不同的运行逻辑。团体身处纷繁的社会情境之中,其组建是集体理性的结果,但行动却未必是一致的,或在表面一致的情形之下其实隐藏着多方博弈的内情。以商会与工商同业公会为例,一为跨行业的组织,一为行业组织,二者组织关系密切。以往统论为工商团体,或将公会完全纳入商会系统中加以论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会的行业性特征,不利于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实,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有着自身的行为标准和运作机制,与商会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起着不同的作用。又如同乡团体,其实乡缘情结在政治人物、商人群体或码头工人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政客有派系,商人有商帮,工会有乡帮,其关系错综复杂,实难以统一性的团体形象完全概括。凡此种种,说明社团史研究中蕴涵着丰富多样的历史主题,如将方法论意义上的社团史关怀与历史景象上的社团史研究结合起来,当有助于近代史研究的进步,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也必将更加丰富多彩。

本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研究”的最终成果。本课题在设计之初,就拟通过对不同类型社会团体的个案及综合研究,来推动对于近代中国社团史的多角度认知。因此,本丛书所辑三本著作可以说是我们尝试对这一主题进行系统探索的初步成果。

郑成林的《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

业(1918—1936)》与魏文享的《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均以同业公会为研究对象,前者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个案讨论行业性的同业公会的具体运作,后者则从宏观角度论述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的中间组织特性。二者均试图在商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视角及问题发掘方面有所突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此前对于同业公会研究的不足。两本著作相互印证、补充,或可初览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概貌,对于推动商人团体史的研究也具有开拓性意义。孙广勇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对近代教会教育系统及中国自办教育系统的教育会进行了综合性探讨,以教育会与新式教育、教育家群体、国家教育管理之间的关系作为论述主轴,探析了团体、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近代民间社团这一宏大的问题域而言,本丛书当然难以尽述其全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这三本书还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十分重视原始历史文献的发掘,原生态的文献是描绘原生态历史的基础。这三本书的主体资料都是在国内外的档案馆中搜淘而出的,且重视对近代报刊文献的利用,许多文献都是首次利用,这使本丛书的史料基础较为扎实。二是注重在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层面上的创新,重视借鉴有关学科理论,有意识地将团体研究置于复杂的历史时空之内,重视团体与群体的结合、组织与活动的结合、专业活动与社会角色的结合,使个案研究凸显更宏大的学术意义。当然,本丛书所辑的三本著作还存在诸多不足,但仁智之见,留待有兴趣于此的学者及方家批评。

在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当然十分必要,但如果没有对历史事实全面、深入的把握,没有对学术史透彻、完整的理解,勉力为之,则过犹不及;或者只是自以为新,实则不然。近代民间社团研究如欲继续推进,正应在此方面多下功夫。

是为序。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20 世纪前“中国教育会”与新式教育的酝酿	(26)
第一节 基督教教育团体在中国的出现	(26)
一、维新变法运动前外国传教士在华教育概况	(26)
二、基督教教育团体的出现和初步发展	(35)
第二节 “中国教育会”“三年会议”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46)
一、1893 年的第一次“三年会议”	(46)
二、1896 年的第二次“三年会议”	(52)
三、1899 年的第三次“三年会议”	(64)
第三节 戊戌政变前西方传教士群体的中国教育变革设计	(76)
一、教育管理体制	(76)
二、学校系统	(80)
三、教学内容	(83)
四、传教士与士大夫的两度合作	(87)
第四节 “中国教育会”与以教会教育为主体的新式教育	(94)
一、近代以来西学在教育观念变革中的作用	(94)
二、传教士教育团体与以教会教育为主体的新式教育	(100)

第二章 清末新式教育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教育会与

教育家群体 (119)

第一节 取法东洋与传教士教育家的反应 (119)

一、20世纪初学习日本活动的蓬勃开展 (119)

二、传教士对学习日本活动的引导 (123)

三、传教士对学习日本活动的反应 (127)

第二节 “中国教育会”的应对与教会教育的系统化趋势 (130)

一、“中国教育会”第四次“三年会议”对形势的认识 和决定 (130)

二、立案注册问题与教会教育的独立发展 (136)

三、清末教会教育的系统化与“中国教育会”的作用 (140)

四、基督教文化教育组织的分化——案例分析 (155)

第三节 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集结与教育团体的涌现 (164)

一、清末教育改革的仓促推行 (164)

二、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集结与教育会的兴起 (173)

三、清末时期的江苏省教育会 (184)

第四节 两个群体的并存和共进 (203)

一、清末教育会组织的人员构成 (203)

二、教育变革的新动力 (209)

三、两个群体的并存和共进 (213)

第三章 民国前期教育会系统的成形与新式教育的定型 (218)

第一节 教会教育的地域化与“中国教育会”的重心下移 (218)

一、辛亥革命后教会教育的新发展 (218)

二、“中国教育会”的改组和改名	(224)
三、“中国教育会”与教会教育系统化趋势的地域性取向	(228)
第二节 中国教育界新知识分子为进一步集结.....	(240)
一、民国初年各地教育会的组织和活动.....	(240)
二、民国时期的江苏省教育会.....	(254)
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其他全国性教育社团.....	(269)
第三节 五四运动后教育会活动的扩张.....	(287)
一、各省教育会及其联合会与壬戌学制.....	(287)
二、各省教育会及其联合会与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299)
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参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309)
第四节 政治转型与教育会的终结.....	(320)
一、从“双体”到“一体”	(320)
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326)
三、清末民初的社会自组织与“第三领域”	(329)
结 语	(335)
参考文献	(344)
后 记	(349)

绪 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教育从以科举为目标的传统封建教育逐渐转化为以知识和能力为中心的近代分科教育，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实现了艰难的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教会教育与中国人自办教育长期共存和分立。二者虽然交汇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洪流中，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实现融合，而是并存于世，构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双体”结构。与此相对应，在这两个并立的教育体系中，分别出现了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会”和中国教育界依照晚清学部和其后的民国教育部有关章程成立的各省、县市和城镇乡教育会及其全国联合会。本书标题中的“教育会”就是专指这两类组织，而不是近代所有取名“教育会”的团体。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这两类教育会从属于不同的教育系统，“中国教育会”是在华传教士的组织，是教会教育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产物，而各地教育会及其联合会则是中国教育界自身的团体，来自中国新式教育的需要；其所属尽管不同；但二者在各自教育系统内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又有诸多相同之处。

首先，它们都居于教育行政主管和学校之间，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在华教会学校多数隶属于各差会，一切重要的决定都要得到差会总部或者其任命的董事会的同意，各差会还拥有教会学校一切财产的处理权。“中国教育会”显然是一个横跨各差会的组织，但它又不是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其成立得到 1877 年和

1890年两届在华传教士大会的批准，在教会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官方地位。中国人自己的各地教育会组织也是如此，处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其成立得到官方的批准，但它们不是官办社团，并不完全听命于政府，而是作为教育界知识分子的集合体，站在教育界的立场上，维护新式教育事业的利益。与一般的纯民间社团不同的是，教育会往往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参与地域范围内学校的管理，所以有人将其称为“半官方”的社团。

其次，它们都是教育家和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的集合体，具有明确的代表性。“中国教育会”主要由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组成，既有著名的传教士如李提摩太、傅兰雅、林乐知、花之安、狄考文、谢卫楼、潘慎文、卜舛济等人，也有大量来自教会学校基层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几乎所有从事近代教会教育事业的著名传教士都曾经是“中国教育会”的成员。中国教育界的各级教育会组织同样是教育界知识分子的集结地，从热心教育的商界人士、著名的教育家到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人员和各级学校的教员都被教育会囊括其中。张謇、唐文治、张伯苓、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郭秉文、蒋梦麟、胡适等人都是各地教育会的成员。无论是传教士的“中国教育会”还是中国教育界的教育会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代表当时特定的教育家和教育从业人员群体。

第三，它们在内部都具有系统性，并且构成全国性的体系。传教士的“中国教育会”从一开始就面向全体教会学校，后来伴随着教会教育事业在中国各地的发展，“中国教育会”各地分支机构纷纷建立起来，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教会教育组织系统，具有内部沟通和协调的能力。有意思的是，中国教育界的教育会组织是先有各省及各县市、各城镇乡教育会组织，然后出现全国性的教育会联合会，最终同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发挥出整体的作用。应该说，这样两个系统对各自所面对的教育体系的影响是民间或者专业社团所不能相比的。事实上，它们在各自的教

育系统中构成力量的一极，牵动着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四，虽然它们的成立得到各自官方的批准，并且有专门决议或制度规定其性质、宗旨和功能，但是它们的实践活动都超出了各自决议或制度规定的范围，在不断适应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中表现出顽强的自主性。基督教“中国教育会”最初继承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其工作内容无非是出版教科书、统一术语的译名和推行统一考试。但实际上，该会在上述工作之外还团结教会教育家群体，传播教育理论和方法，参与中国教育变革，处理教会教育与中国自办教育的关系，推行教会学校课程和管理制度改革等，有力地促进了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和系统化。中国教育界的教育会更是如此，晚清政府建立教育会的本意是设立教育咨询机关^①，然而它们在制度所规定的研究教育问题和“建议于官厅”之外，还积极参与地方教育管理和政治活动，凝聚教育界群体的力量，逐渐成为教育界的“民意机关”，在教育经费保障，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引进国外教育方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它们还自行发起成立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使各级教育会组织联合起来，成为教育界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两种从属于不同教育系统的教育会组织所具有的共性是激发笔者对近代教育会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首先，这种共性是怎么产生的，与近代社会转型和教育变迁的关系如何？为什么在近代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中，出现了结构、功能和特征相似的组织？近代教育变迁是在非常复杂的形势和条件下发生的。简单地说，其中既有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入侵，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相承和相争，又有诸如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教育救国、争夺教育领导权、解决教育与社会实际脱节

^① 熊贤君：《中国教育行政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355页。

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中国教育的独特问题和特殊结构，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教会教育和中国自办教育的长期并存。在这个“双体”结构的形成和作用过程中，两种规模巨大的教育会组织作为近代教育界知识分子“合群”的产物，显然占有一定的位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描述近代教育变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揭示近代教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其次，本书要探讨的是教育会以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实现“合群”，通过什么活动方式达成“合力”。“合群”所指的是教育界知识分子集结起来，形成目标基本一致的群体。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对“群”与“合群”的提倡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群”的观念与严复所介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所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是近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教育会是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合群”的产物，需要探究的是：在近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合群”的前提和动力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合群”之后如何实现“合力”，进而成为有力的社团组织？对于基督教传教士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合群”和“合力”的问题更是具有独特性，可以揭示教会教育内部的结构问题。

最后，近代教育会组织的历史作用是本书研究的落脚点。无论是对教育会与近代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还是对教育会“合群”和“合力”机制的探讨，最终的目标还在于探索其历史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教育会对近代教育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两种教育会组织彼此的力量消长和在中国教育整体中的地位变化。对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而言，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是清末新政时期，晚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广泛建立新式学校，进而停止科举考试，使新式教育成为国家教育的主体；另一个是民国初期，1922年的壬戌学制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在此之前，新式教育实际上处在不断的探索之

中，没有出现基本稳定的各级各类学校体系、课程体系和学程系统。教育会作用的鼎盛期恰好与这两个时间重合。清末新政之初，正是传教士所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时期，而1922年前后则是中国教育界的各地教育会组织力量最为强盛的顶峰时期。这种时间上的重合显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与各自所代表的教育系统的力量消长和现实条件变化密切联系的。对教育会组织历史作用的研究，对于揭示近代教育变迁的真实图景无疑是有帮助的。

如前所述，本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种教育会组织，第一种是1890年成立于上海的基督教教会教育组织“中国教育会（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该会是1877年第一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成立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①的继承者。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召开时，为了满足教会教育发展的需要，大会通过议案，成立“中国教育会”，继承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的所有财产和工作，并确定该会的宗旨是“提高对中国教育之兴趣，促进教学人员友好合作”，主要工作包括编辑和出版供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谋求教会学校教育上的互助，以及探求和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1916年1月，该会更名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②。其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1949年后撤销。近代使用“中国教育会”这个名称的组织还有1902年由蔡元培、蒋智由、王季同等人发起的暗中鼓吹革命的中国教育会，以及1911年6月晚清学部组织召开中

① 这一委员会的名称在学术界有多种译法，本文参照英文原意翻译为“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② 该会的中文名最初继承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的中文名称“益智书会”，1902年改称“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称“中国教育会”，1916年再改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以英文名称的汉译为准，即1916年以前称该会为“中国教育会”，1916年以后称该会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

央教育会期间，由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发起的中国教育会。本书在叙述之中，除非特别说明，“中国教育会”即指基督教教会教育组织，全部以双引号（“”）标记，以示区别。1916年1月该组织改名之后的有关叙述使用“中国基督教教育会”指称该会。在本书的结语部分则使用“中国教育会—中国基督教教育会”概指该组织。在名词的使用上，除非有特别的说明，本书中“基督教”一词专指区别于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①。

本书研究的第二种教育会组织是特指中国教育界依据1906年晚清学部颁布的《教育会规程》、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会章程》和191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修订教育会章程》建立和运行的省、县、市、城、镇、乡各级教育会，以及成立于1911年的各省教育会联合会和成立于1915年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事实上有些省教育会组织在1906年《教育会规程》颁布之前就已成立，如江苏学务总会即是。但在该规程施行之后，已经成立的教育会也按照该规程修改了自己的名称和章程。如上述江苏学务总会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章程的内容也修订为与该规程相一致。这些教育会组织成立于清末社会转型和教育变革之际，其初衷在于“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在“学堂教育方见萌芽，深明教育理法之人殆不数觐”之时，希望教育界“互相切劘，互相研究”，以“尽劝导之责，备顾问之选”^②。由于同时得到官方、地方绅士以及教育界的支持，在清末民初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它们不但研究和推广新式教育，而且参与政治，维护教育界的权益，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其

^① 在中国，“基督教”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用法是基督教所有各派的总称，与外文一致。狭义的用法则专指基督教新教。参见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13页）。

^② 清学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朱有瓚：《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性质略似同一时期商界的商会^①组织，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团体，其组成人员和方式是民间的，但是地方官员也厕身其中，同时还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与纯官方或者纯民间的教育社团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区别。清末以教育会为名的除上述组织外，还有前面提及的蔡元培等成立的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张元济发起的纯民间性质的中国教育会，以及清末学部组织的官方组织中央教育会，佛教界为维护庙产成立的僧教育会等，考虑到本书的写作主旨，这些教育会未被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但是为了凸现本书所研究的两种教育会组织的属性和特征，本书对几个不以教育会为名的社团也有所论述，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

此外，“中国教育会”在清末民初建立了一些地方性基督教教育会组织，与中国教育界的各省教育会可能产生混淆，本书在“中国教育会”的地方教育会组织名称中加“基督教”三字，以区别于中国教育界自身的教育会组织。如“中国教育会”下属的福建教育会，在本书中使用“福建基督教教育会”的名称，以区别于中国教育界自己的福建省教育会。

二

由于教育史研究的重点一直以来在于教育思想、制度和学校，近代教育会组织的研究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关的研究论著不多，内容也相对简单，而且归类于社团研究之中，专门针对教育会这一独特组织的研究尚比较少见。

对“中国教育会”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教会教育的研究专著之中。王立新先生在其专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中以“群体的努力：从益智书会到中国教育会”为标题，对清末

^① 有关商会的性质及其与新式社团群落的关系，请参见朱英先生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时期“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作用进行了研究。显然，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教育会”的群体作用，将“中国教育会”看做是从事教会教育的传教士群体组织。该著作研究探讨了“中国教育会”对晚清教育改革事业的干涉，以及“中国教育会”对教会教育所产生的作用。对于前者，该书指出传教士群体在戊戌变法期间曾试图控制中国教育变革，虽然没有实现这一目的，但也确实成为19世纪在中国传播西式教育的主角；对于后者，作者认为，“作为教育家的组织，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在帮助完善教会学校教育功能，实现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和正规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胡卫清先生在其著作《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中多处论及“中国教育会”。该著作将基督教教育事业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过渡发展时期（1877—1889）”、“基督教教育体制的完成时期（1890—1920）”和“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挑战的时期（1921—1927）”，而“中国教育会”的成立被认为是第二个时期，也即“基督教教育体制的完成时期”开始的重要标志。该书强调“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有一个专门性的团体组织来探讨教育方针、课程结构、教学方法等牵涉教育的各方面的问题，否则就难以使教育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②，“中国教育会”正是为满足此类需求而成立的专门组织。

对“中国教育会”作出比较系统和详细研究的是美国学者郭爱理（Gregg A H）所著的《中国与教育自治》（*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一书。该书将教会教育分为三个不同的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49页。

^②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61页。